

## 探寻中国兵法制胜之道

## 汲取中华传统兵学治军智慧

■刘志兵 顾 喆

引言

习主席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治军历史,在长期治军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体用贯通、兼容并蓄的军事治理传统和治军文化。全面加强军事治理,需要从这些丰富而优秀的治理传统和治军文化中汲取智慧养分,努力培育适应时代发展、服务强军实践的新时代军事治理文化,助力中国特色军事治理厚积薄发、行稳致远。

## 强调“兵权贵一”

军队是以暴力手段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自产生之日起就强调领导权和指挥权的集中统一。学界通常认为,夏代是中国军事史的开端,禹征三苗时所统领的军队“济济有众,咸听朕言”,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当时军队高度集权的治理程度。启征有扈氏,严肃要求官兵“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强调必须服从指挥。为完善一元化的军队领导体制,西周时就建立了全国最高军事管理机构制度——司马制。大司马“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受天子之命统管全国的军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吴子》讲:“兵权贵一。”《六韬》讲:“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中国古代治军史告诉我们:军权集中统一是军队能打胜仗和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条件。我们党从独立创建人民军队之初,就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将之作为立军之本、建军之魂,成为我党我军政治特质、根本优势。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兵权贵一”中汲取传统智慧,维护新时代人民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既充分发挥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政治优势,为军事治理、能打胜仗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又通过军事治理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机制更加完善,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 注重“齐众以律”

兵以治为胜,治以严为要。中国历史上的岳家军、戚家军都以纪律严明著称。中国传统军事治理文化历来强调治军从严,古人早在商周时期就对军队严守纪律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周易》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就是说,军

队打仗要执行严格的纪律,如果不遵守纪律,就会带来凶险。《军志》讲:“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古代治军还特别强调用信赏明罚来整肃军纪。《孙子兵法》把“赏罚孰明”作为胜败的“五事七计”之一。《六韬》有言:“赏如高山,罚如深溪。”又言:“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党历来把从严治军作为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齐众以律”中汲取宝贵经验,执行自觉严格的纪律,以严正纲纪,以严肃军威,以严出战斗力。

## 推崇“爱兵恤兵”

中国古代治军受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影响,总体上要求“上贵贱之伦经”,在军队成员中树立尊卑观念,“上下不可相侵”。但为了赢得兵心,取得作战胜利,不少将领都有爱兵恤兵的带兵传统。《诗经》中讲:“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孙子兵法》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认为,为将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这里的“仁”,主要是指对部下真心关爱。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吴起爱兵如子,“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得士卒心,士卒甘愿为之赴死,“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诸葛亮说:“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方面的古训很多,说的都是培养官兵友爱之情。坚持官兵一致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爱兵恤兵”中汲取传统美德,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把一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使一切聪

## 强化指挥的“五种意识”

■刘利军 张震紫

## 挑灯看剑

当今时代,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面对体系对抗、多域融合、智能无人等特征叠加的现代战场,科学高效的指挥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指挥员只有不断强化正确的指挥意识,才能提升指挥质效,进而赢得战场主动、夺取战争胜利。

“用势”意识。“善战者,求之于势。”“势”是一种无形的作战能量,用好势能够在战争博弈中处于主动地位,进而制敌制胜。当前,军事科技的发展,驱动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不断演进,新的“势场”正在形成。只有重视用势,善于用势,察势、蓄势、用势,创新运用制胜战场的武器装备、作战力量 and 战略战术,方能做到顺势而动、因势而变、以势制胜。

“体系”意识。“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现代战争是体系和体系的对抗,基本作战形式为联合作战。只有始终抓住作战体系构建这个根本,充分认识和适应现代作战体系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强化综合对抗、整体制胜观念,增强融入体系、利用体系、服务体系的意识和能力,自觉在大体系的全局中筹划组织自身力量运用,才能使各个时空、各种力量、各类行动紧密衔接、高效联动、互补增效。

“庙算”意识。“夫未战而庙算胜

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来临,战争“庙算”越来越复杂。只有在思想上重视“庙算”,善于借助智能化指挥控制系统,通过未战先算、战前精算、战中妙算,对“为什么”“怎么打”等问题形成正确判断,并精拟、精算、精评作战方案,才能确保作战的科学性和战术的合理性,达成以最佳资源配置和最小作战损耗取得胜利。

“应变”意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变是战场永恒不变的特征,现代作战多元一体、多域融合、多维并行,技术更加先进、战场更加透明、对抗更加激烈、态势更加多变。对此,指挥员既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还需要极强的战场应变意识,能够全程掌握敌情和态势变化,在作战中灵活应变制敌,做到敌变我变、先变于敌,“致敌而不致于敌”。

“简约”意识。“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是自有战争以来的一条军事通则,也是作战取胜之要。这就要求尽可能压缩己方的作战循环周期,在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上快于敌人。现代作战进入“秒杀”时代,实现快速高效决策指挥,就要优化指挥控制系统,充分运用先进指挥手段,剔除不必要的指挥流程,精简指挥口令和作战文书,大幅压缩信息流转和作战循环用时,从而“以简生快、以快制胜”。

(作者单位:武警兵团总队)

明才智充分涌现出来。

## 讲究“备战求胜”

军队的使命在打仗,军队的价值在打胜仗。历代治军思想都强调围绕打胜仗建军治军。《商君书》指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孙子兵法》把军队建设、战备与作战放在一起论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还分析“五事七计”来庙算战争;管子强调军队要做到无敌于天下,就要在经费、武器、兵士、管理教育、军事训练、情报、策略等方面强于敌人;《司马法》强调军队编制要保证最大限度提高战斗能力,“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这些都是从打仗的角度来看治军。历代兵书,如《孙子兵法》《吴子》《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等,几乎都有建设和战备的专门论述,各自从军队指挥、训练、兵员、兵器、工程、后勤,以及政治、经济等与军队建设、军事治理相关的角度论述建军治军与备战求胜的关系,体现了战斗力标准和为战施治的治军价值追求。我们党向来强调围绕打胜仗开展建军治军活动,把战斗力有效供给作为建军治军的使命所系。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备战求胜”中汲取丰富营养,强化向战而治、为战施治的使命引领,坚持战建统筹,围绕战斗力供给推进军事治理活动,催生先进战斗力。

## 厉行“遵道尚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治国有道”“治军有道”,并将治国治军的“道”创设转化为律规制度之“法”,强调“治国尚礼,治军尚法”。“凡兵,制必先定。”中国早在夏商就揭开了以法度治理国家和军队的帷幕,奴隶社会的治军思想,主要体现在完善军事法典上,所谓“古者司马法”,就是军队建设的法典,其内容包括了军制、军容、军礼、赏罚等各种规定。这些军事法典蕴含丰富的法治思想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的开始,就明确地把“法”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之一。《吴子》提出,兵不在众,以治为胜。尉缭子认为,昔日齐桓公、吴子、孙子等能以“兵少”称霸,而现在的国君却不能以“兵众”成名,主

要原因是缺乏治理军队的各种制度。《吕氏春秋》考察军队治理的情况发现,凡是治理得好的军队,总是把法制建设看得极为重要,“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于彼矣”。《管子》言“道法行于国”。荀子言“法者,治之端也”。《韩非子》言“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这些都是强调法对于治国治军的极端重要性。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基本方式。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遵道尚法”中汲取治军思想,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发挥好法治的引导、规范、推动、保障作用,推动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 追求“变法图强”

军队建设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为前提,富国强兵则是军队“变法”强有力的牵引。我国历史上,夏代就建立了以地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商代晚期,为适应对内镇压和对外征战需要,开始有了“师、旅、行”的固定军事编制,至西周时期形成了“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系统,被兵家看作是“军之大刑”。赵武灵王顺应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赵国的军力大增。商鞅变法建立军功爵制,健全户籍,什伍编组,秦军兵力大增,一统天下。王安石变法推行置将法,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将领,专门负责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并推行保甲法,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北宋国力有所增强,积弱局面得以缓和。晚清洋务派开展“师夷长技”的“自强”运动,本着“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指导思想,推行军事变革,发展先进武器装备,采用西法改革军制,创练新军,推动了近代化军队的建立。改革是决定我军发展壮大、制胜未来的关键一招。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变法图强”中汲取创新智慧,把改革作为解决军事治理矛盾问题、驱动军事治理创新突破的必由之路,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军事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矛盾问题,推动军事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

## 群策集

“战争迷雾”是指战争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状态,是研究战争、打赢战争不能回避的问题。随着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装备的广泛运用,现代战场上传统“战争迷雾”不断减少,但新军事变革引发作战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使得战场新的“战争迷雾”不断增加且较以往变得更为复杂。厘清现代“战争迷雾”之变,对于指挥员驾驭战场的不确定性并夺取战场主动权有着重要意义。

多域并存加深“战争迷雾”。作战域是作战活动的界限和范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作战域在不断拓展,从单域到多域、从传统到新兴,既包括传统陆、海、空三维作战域,也覆盖了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等更多更广泛畴,多态多域并存成为常态,战场感知任务剧增、难度加大,使得现代战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同时,未来战争中作战体系各要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各种关系复杂叠加,复杂系统任何一个微小变化,即使是看似平常的一个作战单元被毁,或一次小规模作战行动,都可能造成“蝴蝶效应”,带来战场态势的非线性跃变,对作战产生颠覆性影响,导致“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由此引发更多“战争迷雾”。

新兴技术加大“战争迷雾”。战场对抗,如若在严格保密、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首次运用一项新技术或一件新武器,往往能让对手防不胜防、束手无策。新兴技术和装备运用的不可预见性和突发性,为战场蒙上了新的“战争迷雾”。当前,军事领域新兴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武器装备迭代更新周期大大缩短,新型武器装备不断问世、快速运用,将技术突袭凸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兵力运用多变带来的“战争迷雾”,隐身化、微型化、精确化、智能化、远程化、全天候的技术装备和武器平台的运用,将极大增加未来“战争迷雾”。尤其是新兴技术武器装备中最具活力的智能武器,具有自主决策和行动能力,有时甚至能超越人类认知而进行自主作战,使得战场情况更加难以预测和掌控。

数据过载加剧“战争迷雾”。在传统作战中,往往因为信息缺乏而产生“战争迷雾”,而随着战场数据呈爆炸式增长,数据信息量急剧增加,重复、冗余、异构的数据越来越多,有用信息“浓度”逐步下降,“价值密度”不断收缩,无效信息逐步“泛滥”。以往信息缺乏问题已经逐步被信息数据过载取代,爆炸式增长的海量战场数据,对思维带宽有限的人脑和计算平台算力都是极大考验,指挥主体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庞大的“数据洪流”,要想在海量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更是难上加难。战场非但没有因为信息增多而更加“透明”,反而战场“雾更浓”,给理解、判断、决策过程带来极大困难,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将成为产生新“战争迷雾”的重要诱因。

信息诱变加速“战争迷雾”。随着战场机动能力、指挥控制能力、远程打击能力等作战能力的提升,现代战争作战双方博弈过程中心,定下决心快、部署调整快、机动打击快、资源流转快,交战胜负成败就在分秒毫厘之间,呈现“即时秒

## 厘清现代「战争迷雾」之变

■胡有才 周文

杀”态势。战场信息获取是否及时适时将造成信息迷雾,受制于情报侦察手段、指挥员理解和认知能力、指挥平台情报信息分析算法算力等因素,作战中得出的情报分析产品往往滞后于战场最新变化,如获至宝的情报信息往往成为“旧闻”,“山那边的情况”往往是“明日黄花”,情报信息的价值骤减。由此可见,“时间差”将成为新的限制性因素,快速变化的战场与情报获取处理运用能力形成新的矛盾,“战争迷雾”有增无减,给指挥员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欺骗伪装加重“战争迷雾”。“假作真时真亦假”,现代信息欺骗伪装技术获得极大发展,特别是隐身技术、电子干扰与反干扰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敌方目标更加难以发现和识别,为战场隐身数据,对思维带宽有限的人脑和计算平台算力都是极大考验,指挥主体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庞大的“数据洪流”,要想在海量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更是难上加难。战场非但没有因为信息增多而更加“透明”,反而战场“雾更浓”,给理解、判断、决策过程带来极大困难,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将成为产生新“战争迷雾”的重要诱因。

信息诱变加速“战争迷雾”。随着战场机动能力、指挥控制能力、远程打击能力等作战能力的提升,现代战争作战双方博弈过程中心,定下决心快、部署调整快、机动打击快、资源流转快,交战胜负成败就在分秒毫厘之间,呈现“即时秒

## 把握军事理论研究内在要求

■郭松岩 冯金波

## 谈兵论道

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推进理论创新创造、充分发挥先导作用,是近百年党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经验,是新时代人民军队伟大变革的实践启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领域多方面入手,其中关键之处就是要牢牢把握军事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

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战场是军事理论的运用空间,指明了其服务打赢的价值取向。面向战场,就是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加强核心作战概念开发,把战争制胜机理真正搞清楚,把与谁打仗、在哪里打仗、怎么打仗切实搞明白,加快发展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理论和作战思想。部队是军事理论的运用主体,蕴含了其创新发展的智慧源泉。面向部队,就是要破解部队建设和发展的难点问题,立足部队战训实践发掘军事理论的生长点和创新源,提出让部队官兵看得懂、用得上的知识、观念和官方,用新时代练兵备战实践升华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未来是军事理论的运用时间,规定了其前瞻先导的基本属性。面向未来,就是要抢占“寂静

新时代有效履行“四个战略支撑”使命任务的思想宝库,本质上就是新时代党的军事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蕴含着马克思主义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军事理论研究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特别是坚持用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军事理论创新各领域和全过程,使军事理论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战场是军事理论的运用空间,指明了其服务打赢的价值取向。面向战场,就是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加强核心作战概念开发,把战争制胜机理真正搞清楚,把与谁打仗、在哪里打仗、怎么打仗切实搞明白,加快发展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理论和作战思想。部队是军事理论的运用主体,蕴含了其创新发展的智慧源泉。面向部队,就是要破解部队建设和发展的难点问题,立足部队战训实践发掘军事理论的生长点和创新源,提出让部队官兵看得懂、用得上的知识、观念和官方,用新时代练兵备战实践升华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未来是军事理论的运用时间,规定了其前瞻先导的基本属性。面向未来,就是要抢占“寂静

战场”的战略制高点,构建适应时代发展和战争形态变化的“未来学”,充分彰显军事理论塑造未来的引领功能。在“三个面向”中,面向战场居于基石地位,它是军事理论要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的出发点 and 归宿点,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则是军事理论面向战场的必然要求,三者有机统一于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中。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创新,都带来战争形态新的转变,也强制性地要求作战双方的对抗方式升级进阶。在这条逻辑链路上,科学的思想观念发挥了中心环节作用,推动和塑造了科技之变引发战争之变和对手之变的发展进程。面对“三个之变”,军事理论研究必须紧盯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窥见战争形态演变的端倪,研判作战对手的动向,以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赢得军事理论创新的“先期作战”。

攻克理论急中之急、难中之难、艰中之艰。军事理论研究,既是理论问题、认识问题,更是实践问题、行动问题。时代

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主义军事家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期盼,也是我军建设的时代课题。在前人那里找不到模板,也不能套用外军的翻版,迫切需要对新的事实作出新的分析、概括与抽象,需要理论创新在新起点上再出发,用军事理论之“矢”射中强军实践之“的”,打通攻坚冲刺路上的关节堵点。要坚持问题导向,理论创新需要循着作为“时代声音”的问题展开,紧扣战之所指、建之所向、备之所需,聚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回答好战建备一体推进的实践之问。要立足实践提炼,扎根于战建备的具体实践之中,善于从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让理论研究与战建备创新实践同频同向。要坚持研用一体,适应作战理论更新快、周期短的需求,形成“提出问题—实验评估—试训演练—部队应用”的作战理论创新闭环,突出部队实践检验理论、反哺理论的实证环节,实现研用互促共进。要构建包括发现、遴选、培育、运用多环节于一体的全链路管理机制,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提升军事理论转化运用的效能。